我有师大

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 1989 级　施春宏
（现为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教师）

在母校暨母系即将迎来九十华诞之际，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生王文柯同学来信，希望我们这些“漂泊在外”的老学长们回忆一下在母校母系求学期间的美丽瞬间。一晃，从母校走出来竟然已经 24 年了，我已年至半百，真是岁月不饶人。这二十多年间，母校在我心中，一直是神一样地存在着。我在十年前出过一本书《汉语动结式的句法语义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8 年），后记中的一段话表达了我对母校老师的感激之情：

> 我在安徽师范大学读书时，文学概论课老师陈文忠先生在近两年的时间里花了不少心血培养我在文艺理论方面的感觉，甚至将自己的读书笔记借给我研读。我现在对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仍保有较为浓厚的兴趣，是与先生的耳提面命分不开的。蒋同林老师是我决定学语言学后给我指导最多的老师，每学期的两三次长谈成了我最大的享受。大学毕业后，蒋老师一直关心我的生活和工作。还要感谢年级学习导师陈宪年先生、汉语语法分析课老师朱景松先生、从未给我们授课的陈庆祜先生和卢英顺先生等的谆谆教导。还有很多文学课和语言学课的老师们，我无限崇敬和感谢他们。每次回想起大学时与先生们的或长或短、或老师家中或校园路上的交谈，都让我十分感动。

当然，这只是浅描。现在不妨借这个机会将其中的两幅场景再浓描几句，以表达我更加浓烈的思校之情和感恩之心。

我本是一名中专生，1986 年安徽省宣城师范学校（四年制）毕业后被分配到青阳县新河中学教了三年书，后来跟高中生一道参加全国统考而成为师大的一员。这样一来，就比同届同学一般要大三四五岁，算是个“老”学生了。也许是当过几年乡村教师的缘故，在师大的四年里，我跟许多老师有过比较多的接触，他们的学问和人格深深地引导着我。这里就回忆一下陈文忠老师和蒋同林老师对我的指导和影响。

在上中专之前，我的阅读经验，除了《三国演义》《水浒全传》和一些连环画，就只有课本了；而中专期间，我也许是同班同学中文学作品读得最多的人，其他杂书也翻了不少。算是求知若渴吧。刚进师大时，我除了对文学作品痴情不改外，还对文艺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完全得益于陈文忠老师的教导。也许是文学概论课上做过一两次不太差的作业，让陈老师注意到了我，或者是我主动接近了陈老师。本科生去老师家接受教导，现在是难得一见了，而那个时候很常见。陈老师欢迎我去他家聊天。大概是第一学期结束时，便去凤凰山陈老师家拜访了一次。陈老师开了几本美学、文艺理论和思想史方面的书目让我回去看。由于记忆力一直很差，具体内容现在都已不甚了然，记得比较清楚的作者有伍蠡甫、钱钟书、罗宗强等。后来先生还推荐我看黑格尔的《美学》，说真的，硬着头皮啃，也没看出个道来。有次去拜望时，先生便拿出他的几本读书笔记让我带回去看，学习如何阅读和思考。我至今仍对此感慨万端，感激涕零。这样的“互动”一直持续了近两年吧，直到我自己的专业兴趣

后来出现了“语言学转向”。大三大四时仍然每学期都去先生家拜望，此时除了跟陈老师读小学的女儿陈凡凡讲故事外，聊的话题多了一些民生和时政。我师大毕业后一直跟陈老师保持联系，尤其是教师节和过年边上，总想跟先生说几句话。陈文忠老师在学生中“呼声很高”，先生上课时的激情感染着每个听课的学子，几十年都丝毫不减。去年我还在网上看了陈老师的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文学理论”的几节视频，那立意，那声音，那神态，那书法……我们的陈老师，还是那样年轻，纯真，充满激情。

说到我的“语言学转向”，就要特别感谢蒋同林老师了。这还得从大一说起。我们大一的现代汉语课分成两个学期上，上学期是语音和词汇，下学期是语法和修辞。虽然我上过中等师范，对中师生来说，“三字一话”是基本要求，但我的那个“一话”却总是一难（困难 nán，劫难 nàn）。大一时我便被列入了“补习”生而受到特殊对待。因此，我第一学期的现代汉语学得并不怎样。后来我的硕士生导师于根元先生也批评过我的普通话；博士毕业找工作也因普通话而不能去某些部门；在北京语言大学教书时，特别擅长纠音的刘广徽老师连着给我补了六七次课也未将我改造好。哎，永久的痛。有趣的是，我对音系学、韵律语言学却很有兴趣。这些都是后话了。大一下学期的现代汉语课由蒋同林老师讲授。蒋老师的课内容丰富，举例生动，逻辑性强，且常常有着淡淡而隽永的幽默。只是由于当时使用的教材《现代汉语》跟我中专所学教材《汉语基本知识》内容上大同小异，因此我并没有怎么认真听讲。每次上课都坐到最后一排（其实，所有的课都是如此），而且常常翻看杂书，或者伏桌而睡。有一次没有忍住，跟同坐说起了悄悄话。也许声音“超常”发挥了一下，而且时间“超长”，蒋老师走下讲台，从生化楼阔大的阶梯教室的前面一步一步拾级而上走到最后一排，盯了我一眼，说：你可以睡觉，也可以不来，但不能这样说话。而后转过身一步一步走下阶梯，走到讲台上，继续沉静地讲着课。我已不记得那节课是怎样度过的了，反正后来的课都沉默了。有意思的是，最后一次课结束时，蒋老师留给了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家的地址，并说如果将来想学语言学，可以去找他。也许是我这个基本上不怎么听课的学生，期中考试或平时作业给先生留下了一些特殊的印象？我将纸条夹到书里，既感动，又对蒋老师有了更多的崇敬。但大二的大部分时间我仍然沉浸在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以及其他庞杂的理论作品之中，虽然由于中文系的缘故，也看了一些语言学专著。

前行的路上往往充满着困惑和偶然。也许是快到大二下学期结束时，有了初步的考研念头，但也并不确定。考什么呢？这成了当时最大的问题。按我的情况，似乎应该考文学研究或文艺理论。可是，当时新闻出版业很时尚，未来前景很好，于是在朋友的晓喻之下，我便也去赶这个时髦。陈老师得知这个情况后，带我去拜访了潘啸龙老师（中文系教授，本科专业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然而，路有多歧。当初翻看文艺理论著作时就发现，我们的文学和文艺学都时风较浓，有些话不便说，不能说；待一看新闻学著作，更是如此。也罢。后来一想，法学专业也不错，于是找过几本书来看看，感觉还是那样。再罢。何去何从？还是学语言学吧；而且自己的数学基础应该对学习语言学有些帮助。这时突然想起了那张纸条。多么有远见的蒋老师！第一次拜望，蒋老师说了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蒋老师开了一些书目，大概是先让我定定神吧。然而，想得太多，就难以气清神定，似乎还是难以确定风该向哪个方向吹。暑假回家帮父母双抢，也就没想这些事了。进入大三后，有个大四的历史系朋友在准备考研，还有英语系和生物系的大三朋友也准备考一下，于是我也就想去试试。比较来比较去，还是语言学亲……就语言学了。那个时候，考研报名不限学历，不管出身。我立

即登门请教蒋老师，先生的一席话解决了大部分问题：支持我大三考研，而且报考复旦大学，并让我去联系刚从复旦毕业两年的卢英顺老师（卢老师现为复旦大学教授）。其实，考研结果出来之前，也只有蒋老师和卢老师知道我的考硕之事，并得到了他们的真切指导，而这一切都是在“地下”进行的。

当然，考硕的过程也不是那么容易。大三寒假期间就要考试，只有四个多月的备考时间；而且大三的课程也不轻，还要进行期中期末考试；尤其是我还是那么喜欢文学，突然间又喜欢上了展示市民生活和底层生态的元代文学，看了特别多的元曲。当然，时间短不是问题的根本，主要还是考试内容。那个时候，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各一张试卷，前两门我似乎有了一些基础，大二下学期的语言学概论则学得有些糊涂，恐怕连音位的本质都没有弄明白。最麻烦的还是庞杂的政治和我的哑巴英语。最后的结果很出意外，竟然考了个现代汉语专业第一。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专业那年拟招 5 人，等额面试，面试导师是汤珍珠先生和游汝杰先生。面试和复试加试都比较顺利，最后拿到了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来……后来因为调档问题而未能成行，失去了求学复旦的机会。大四时重新考研，蒋老师建议并推荐我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于根元先生。成为于先生的硕士，是我人生最大的幸事之一，于先生的应用语言学理论尤其是“交际值理论”，深深地指导和影响了我这二十年的学术研究。

其实，蒋老师对我的指导不仅在学业上，生活上也是如此。为了生活，我在大三大四期间在芜湖市的几个小学办过几期学生作文班，周六周日外出上课。这期间，有时去蒋老师家聊聊天，解解惑，提提神。

上面对敬爱的陈老师和蒋老师的回忆，虽然零散琐碎，但已经结构化了我的学术和人生。这些记忆，越沉淀，越香醇。

两位先生对学生的关爱正是师大先生们的缩影。这就是我们的恩师，这就是我们的师大。师大的每位先生都是我们心中的偶像，都是我们不断前行的灯塔。

正是有无数陈先生、蒋先生这样的博大之师、伟大之师，师大才是我的师大，我们的师大。无论走到哪里，师大都是我的师大，我们的师大。

2017 年 8 月 28 日

【王文柯同学：你好！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照片了，似乎也未留下师大生活照，连毕业合影上也未留下形象。不知下面这张是否合适，烦请裁断。也许它能代表我对师大最深挚的感情。】


文学院硕士学位论文答辩
汪红艳
熊仲儒